

血与火的记忆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抗日战争史话

1945-2005

中共和平区委宣传部 编著
和平区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

血与火的记忆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抗日战争史话



《血与火的记忆》

编辑委员会

主 任：李润兰

副 主 任：王行安 路艳青

委 员：李宝亭 吕占华 孙 健 张继宏

顾 问：郭凤岐 罗澍伟

执行主编：张 岩

编 辑：孙 健 张志玉 张国治 康 健

李 军 武 欣

特约编辑：陈 雷 张 明 游铁骥 张子荣

校 对：焦冬梅

封面设计：李志明

序

天津市和平区区长 李润兰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中共天津市委市委宣传部、区党史研究室、区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联合编纂了《血与火的记忆—天津和平区抗日斗争史话》一书,永远铭记和平区人民为全国抗战所作出的流血牺牲,缅怀先辈们的丰功伟绩,弘扬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英勇奋战、热爱祖国、热爱和平的伟大精神,激励全区人民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6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使勤劳善良、热爱和平的中国人民卷入深深的战争灾难之中,日本军国主义用火与剑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国耻与国难是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抗日战争,是一场雪洗百年屈辱,开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全世界人民反抗法西斯血腥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勇的和平区人民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在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下,充分利用租界享有的“治外法权”这一特殊的有利条件,始终处于斗争的前沿,使这里成为抗日斗争最活跃的地区。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抗日组织以租界为依托建立机关、开展活动;热血青年以

租界为营地,主动出击,打击敌人;爱国人士以租界为掩护,筹措资金,购买武器,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斗争,为争取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天津人民革命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血与火的记忆》是一部全面反映和平区抗日斗争史实的资料书,它真实的展示了一幅全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所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前仆后继、英勇奋战的历史画卷,用浓墨重彩描绘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全面完整地反映了天津抗战的历史,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累累罪行,为研究和认识这段历史提供了科学全面的珍贵资料。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们不仅要牢记惨痛的过去,勿忘国耻,珍爱和平,更要明确肩负的历史责任,深刻认识“发展才是硬道理”,发扬热爱和平、建设和平的光荣传统,振奋精神,拼搏进取,为把和平区建设成为“和谐、繁荣、发展”的中心强区而不懈努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目 录

序

日本侵华野心	(1)
日本侵华战争准备	(1)
日本侵华策略	(7)
甲午战争与天津日租界的开辟	(22)
天津日本特务机关	(29)
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	(38)
日本天津驻军	(38)
日本驻屯军司令部	(39)
天津日本义勇队	(43)
“便衣队”暴乱	(44)
白河偷渡	(55)
两报人被杀案	(60)
海河浮尸案	(63)
沦陷时期的天津伪政权	(66)
封锁英法租界	(77)
“强化治安”运动	(84)
日伪的舆论工具——《庸报》	(95)
日租界的“恶疾”	(97)
天津民众抗日斗争的兴起	(103)
天津抗战	(103)

抗日杀奸团	(109)
电话局的“抗交”斗争	(122)
赵天麟被刺案	(125)
朱彭寿殉难记	(130)
天津地下出版的抗日报刊	(133)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	(139)
中共北方局	(139)
中共河北省委	(140)
中共天津市委	(146)
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	(153)
中共天津城市工作委员会	(156)
抗日自卫委员会	(158)
“民先”天津地方队部	(161)
“一二·一八”大游行	(167)
“五·二八”大示威	(170)
中共秘密电台	(175)
地下抗日据点	(177)
知识书店	(180)
吉鸿昌在英法租界的抗日活动	(183)
抗战人物	(187)
抗日救亡大事记	(197)

日本侵华野心

日本侵华战争准备

日本在近代之初,和亚洲其他国家一样,也是在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的炮火下被迫打开国门的。1854年,美、英、法、荷等国相继与日本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日本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但由于明治维新并不是日本人民通过革命取得的政权,因而在掌握了政权的日本统治阶层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企图通过对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的侵略,以求得本国的发展,进而充当欧美各国在亚洲的尖兵,以提高其“国际地位”。吉田松阴是明治维新“元勋”们的导师,他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统治阶层有过巨大的影响。他在1855年曾说:“俄美肯定讲和,我等决不能违次而失信于戎狄(欧美各国)。唯应严章程,笃信义,乘其间培养国力,换取易取之朝鲜、满洲、中国,使失之于俄国之土地,偿之于鲜、满”,“失之欧洲,取之亚洲”。这反映出日本近代初期就已经存在的两种倾向:一是对欧美强国卑躬屈膝,唯唯诺诺;二是对中国、朝鲜这样的弱国处处掠夺,企图在牺牲中国和朝鲜的条件下弥补自己的损失,扩充自己的国力。因此,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天皇就确定了对外扩张政策,宣称要以武力“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由此可见,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由来已久。

1876年,日本海陆军开赴朝鲜,以武力胁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从而获得了在朝鲜的诸多特权和利益。随着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不断膨胀,它对中国的野心也越来越大。中法战争后,在对中国的策略上,日本统治集团分成两派,一派主张不给清政府以喘息机会,立即乘机夺取朝鲜,与中国一战;另一派则主张,日本应积蓄力量,“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待三五年后日本官商“充裕”时,看中国情形再定。1885年6月,日本政府采纳了伊藤博文等人的后一派的主张,除继续向朝鲜渗透势力外,提出了一个以十年为期的扩军计划,作为发动对华战争的准备。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征讨清国策》,准备以主力进攻北京,并分别占领长江流域各战略要地,阻止江南清军北上;如果日本战胜,则将中国的辽东半岛、舟山群岛和台湾、澎湖列岛和长江两岸之地,都划归日本版图,同时将中国其余地方则分割成若干小国,分别受日本监护。这份狂妄的计划还提出:“以五年为期作为准备,抓住时机准备进攻”,对中国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

19世纪80~90年代,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日本统治集团的侵略欲望更加膨胀。它进一步鼓吹“大陆是日本生命线”的所谓大陆政策,准备扩大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1890年12月,日本内阁首相山县有朋在第一届国会上发表施政演说,公然宣称:“国家独立自卫之道,一是捍卫主权线,二是防护利益线。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是也。何谓‘利益线’?即同我国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这里所说的同日本“安全紧密相关之区

域”，就是指朝鲜和中国。日本军国主义正是从这种强权主义出发，发动了侵略中国和朝鲜的甲午战争，开始走上大规模扩张道路。是年3月，山县有朋在给外务大臣的指示《外交政略论》中说：“我邦利益线实在朝鲜、满洲。”这也表明了日本的统治者所主张的不单纯是保卫国土，而是为侵略朝鲜、中国，迅速扩张军备。

在“富国强兵”的总方针指导下，日本的明治政府加紧进行军制改革，建立和扩充适应近代军备的军队。早在1871年，日本便从参加倒幕军事行动的部队中挑选精壮8000人，组成“御亲兵”（后改称近卫兵）。然后整顿原属各藩的军队，并实行中央集权的“镇台”制，在全国设立东京、东北（今仙台）、大阪、西海（今熊本）四个镇台（后又增设名古屋、广岛两镇台）。1872年，为适应武装力量的发展，废除1869年设立的兵部省，分设陆军省和海军省。1873年初，颁布《征兵令》，用普通义务兵役制取代武士职业兵役制，正式建立拥有现役和预备役的近代常备军。1878年，设立直属于天皇的参谋本部（与内阁并行的机关），由它掌管用兵作战等军事大权，政府无权过问。这意味着军国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强化。为适应对外战争需要，日本还陆续创办各种军事学校，制定各种军事条例、章程、官制等，并多次修改陆军编制和《征兵令》。

1880年，日本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以其详细论述中国军备情况的《邻邦兵备略》呈于天皇，力言为了准备日中战争，扩充军备是当务之急。1882年朝鲜“壬午兵变”之后^①，参谋本部便制订具体的对华作战方案，变本加厉地

进行扩军备战活动。至 1890 年,日本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 30%,1892 年超过 41%。1883~1895 年,共开支陆海军费 26900 日圆。

19 世纪 70 年代前期,日本陆军兵力按平时编制为 3.1 万余人,战时编制为 4.6 万余人;海军只有 17 艘军舰(大部为木制舰),总排水量为 13800 吨。经过大力扩充,至甲午战争时,按新的战时编制进行动员,陆军 7 个师团(含近卫师团),加上屯田兵团和对马警备队等,总兵力可达 22 万余人。海军则拥有军舰 31 艘,鱼雷艇 24 只,加上 4 艘代用军舰(武装商船),总吨位达 72600 余吨。其中一部分舰只编成常备舰队,其余分属于横须贺、吴、佐世保三个镇守府。

按照新的战时编制,日本陆军每个野战师团的兵力编制为:2 个步兵旅团(每旅团辖 2 个联队,每联队辖 3 个大队,每大队辖 4 个中队)、1 个骑兵大队(辖 3 个中队)、1 个炮兵联队(辖 2 个野炮大队、1 个山炮大队,每大队辖 2 个中队)、1 个工兵大队(辖 2 个中队)、1 个辎重兵大队(辖 2 个中队)。7 个师团总计将佐以下 12.3 万余人、马 3.8 万余匹、野炮 168 门、山炮 72 门。根据战时需要,可将若干师团合编为一个军,军配有野战电信队和军兵站部等。中日甲午战争时,日本实际动员兵力达到 240616 人,其中 174017 人在国外参战,66599 人留守本土。

在扩军备战过程中,日本当局还抓紧对士兵的军国主义教育,灌输绝对尊崇和效忠天皇的思想,培养封建的“武士道”精神。1878 年以陆军卿名义发布的《军人训诫》,

1882年以天皇名义发布的《军人敕谕》，都是强调军人应该绝对遵守“武士道”的“忠节”、“武勇”、“礼仪”等，使之成为穿军装的奴隶，在侵略战争中盲目地为统治集团卖命。

明治初年，日本大多使用从英、法、荷等国购入的旧式枪炮，后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迅速发展，适应军国主义的需要，建立起本国的军事工业体系。至19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军工生产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生产了一定数量的枪炮弹药和舰船，为发动侵略战争提供了初步的物质保证。

1880年(日本明治十三年)，日本陆军中佐村田经芳对旧式枪械作了改进，制成“村田十三年式”单发步枪(口径11毫米、最大射程2400米)，后又改进为“村田十八年式”(加大初速，缩短枪身，以减轻重量)。随着无烟火药的使用，又于1889年制成“村田二十二年式”连发枪(口径为8毫米、最大射程达3100余米)。甲午战争中，日军步兵除近卫师团和第四师团装备有村田式连发枪外，其余主要使用村田式单发枪。

1885年后，日军装备的火炮，主要是大阪炮兵工厂生产的口径70毫米、最大射程为5000米的青铜野炮，和最大射程为3000米的青铜山炮。野炮以6匹马拖行，山炮炮身和炮架可以分解，用3匹马驮载。

1872年起，日本开始自造军舰，以求改变海军落后的局面。1877~1884年，共自造600至1500吨的军舰6艘，并基本掌握了英法造船技术。以后执行新的造舰计划，在1887~1893年间，造成钢骨铁皮舰和钢质舰共8艘，总排

水量为 13250 吨。与此同时,又从英法等国购入军舰 8 艘,总计 27000 余吨。这些军舰均具有当时较先进的技术水平,装备有较多的速射炮。这些军舰编入舰队以后,使日本海军面貌为之一新,战斗力大为提高。不过,由于日本财力毕竟有限,无力购买和建造大型装甲舰,而又企图击穿中国北洋舰队 7000 吨级的装甲舰“镇远”和“定远”号,便在 4200 余吨的“桥立”、“严岛”、“松岛”号 3 艘军舰上装配 32 厘米口径的大炮,开创了世界造舰史上罕见的“奇迹”。

在扩军备战的同时,日本当局还不断派遣大批特务,到中国和朝鲜进行实地侦察,搜集有关情报。早在参谋本部成立的第二年,就以“武官”、“留学生”等名义派遣官员到中国,刺探清朝政府各方面的情况。1880 年,山县有朋上呈天皇的《邻邦兵备略》,就是根据派遣人员的见闻与调查编撰而成的。1893 年 4~7 月间,日本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等又亲自到朝鲜釜山、仁川和中国天津、北京、上海、南京等地,重点窥探中国的军备、士兵训练、军队装备、地形地貌等。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侵略者早就绘好了包括朝鲜和中国东三省、渤海湾在内的详细军用地图,上面标明了这些地区的每一座小丘和每一条道路。

为做好实战准备,日本还多次进行各种军事演习。1889 年 2 月,专门制定了《陆海军联合大演习条例》。翌年 3 月举行的陆海军联合大演习中,共动员官兵 3 万余人、军舰 20 艘、运输船 3 只。1892 年 10 月,又举行有 27000 余人参加的陆军特别大演习,除检验一般内容外,

还特地演习了预备役的动员、军队的铁路输送等项目。

1893年5月,日本制定《战时大本营条例》。至此,侵华战争的各种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日本侵华策略

日本帝国主义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垄断资本迅速膨胀,侵略胃口越来越大,时刻妄图独霸中国。日本大隈内阁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诱饵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从内容上看二十一条一旦实现,中国就要整个沦亡!因此它遭到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和欧美列强的不满。鉴于此,随后的日本寺内内阁主张采取比较隐蔽的侵略方式,即实行所谓的“菊分根”政策,也就是利用日本垄断资本以投资的手段使中国殖民地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以对德宣战为由放手侵略中国,扩大了在华的势力范围。1922年,华盛顿会议通过的九国公约,强调“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使中国又重新回到被列强共管分享的局面。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日本向中国扩张的范围。

1927年,日本爆发金融危机。4月,政友会总裁、长州军阀田中义一上台组阁。田中内阁力图以强硬的内外政策加强统治。首先以行政手段和巨额贷款平息了金融危机,同时加紧推行资本主义“生产合理化运动”,提高了日本商品的竞争能力。为了镇压工人运动和进步人士,在全国范围内加强了专门搜捕政治犯和思想犯的特别高等警察,并修改“治安维持法”,对政治犯实行死刑。在对外政策方面,田中内阁积极鼓吹武力扩张,阴谋策划对华军事

侵略。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参加者包括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参谋本部的代表和驻华公使、驻沈阳总领事、关东厅长官和关东军司令等官员。会议的总结性文件《对华政策纲领》确定了日本分离满蒙、侵略中国、称霸东亚的方针。东方会议结束后,田中义一根据会议的精神,向天皇写了一份报告,史称“田中奏折”。奏折抨击了华盛顿会议和前一段日本的外交政策,指出只关心日本贸易而不关心日本在华利益的政策,是错误的民族自杀。提出“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吉林之森林2亿万吨,每吨5万,可不劳而获10亿万元……”、“敦化地方工业如大小麦小米每年200万斤,大小酒厂21处……”、“设立男女师范学校,培养有用人才,造成东三省永远亲日本之根本,此乃日本之第一要义!”并指出苏联和美国都是日本推行对华政策的障碍,必须作好同它们交战的准备。1928年4月,台湾苗栗人蔡智堪以补册工人身份赴日本,从事皇宫书籍整理工作。工作中,发现并秘密抄录了“东方会议”的纪要文件,即田中奏折。为了揭露日本侵华的野心,1928年6月,蔡智堪设法将田中奏折转交张学良。1929年,中国《时事月报》将奏折的译文披露于世。这在国际上引起很大的震动(目前中外史学界对奏折的真伪存有争议,但其真实性为以后日本对外扩张的实际行动所证明)。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将侵略矛头对准了华北。为了制造舆论,日本军阀公开叫嚷:华北“在实行日本大陆

政策上有着重要的价值”，并毫不掩饰地指出，日本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华北国”。日本关东军驻华北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给关东军司令部的秘密情报中又说：“现在满洲市场已臻饱和，短时期内亦难再行扩大，……帝国原料与市场的解决，实不能不注意于进攻中国华北。故华北诚帝国之最好殖民地。”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然后以华北为基地，向华东和华南扩张。

1936年8月7日，日本召开以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和藏相为核心的五相联席会议，为其第二年的全面侵华制定了所谓“国策基准”：“帝国鉴于内外的形势，认为当前应该确定的根本国策，在于外交和国防互相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综合其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以全面进攻中国为突破，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的侵略扩张总纲领。它进一步表明，日本帝国主义将随时掀起吞并中国并向亚洲其他国家扩张的侵略战争。

1937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处于内外交困的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它的垂危统治，决定发动对中国的全面进攻。1937年6月，近卫内阁一上台，就致力于建立战时体制，并表明要以战争来摆脱经济危机，因而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

附：《田中奏折》

1927年7月25日

内阁总理大臣田中义一，率领群臣诚惶诚恐谨以我帝国对“满蒙”积极的根本政策奏闻。

对“满蒙”的积极对策

所谓“满蒙”就是指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而言。这里,不仅地广人稀令人歆羡,而农矿森林的丰富也是世界无比。因此,我国为了开发其资源,以培养帝国永久繁荣,特设“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中日共存共荣的名义,对该地的铁路、海运、森林、铁矿、农业、畜产等各方面投资达四亿四千万日圆,这个企业实际是我国企业中规模最庞大的一个。回顾在华盛顿会议签订九国条约以来,我国向“满蒙”的扩展事事受到限制,进而认为彻底解决该地区问题后国际贸易及投资利益借此可以得到保护。

东三省是亚洲的一个政治上不完整的地方,我日本如欲保护自己的安全,并进而保护他国居民的安全,就必须使用铁血,这样才能突破当前的困难局面。然而,如果采取铁血主义来保全东三省,那么第三者的美国必将受到中国以夷制夷的煽动,起来制止我国。这样一来,我国就要被迫与美国进行角逐。

过去的日俄战争实际上是中日战争,将来如欲控制中国,必须首先打倒美国势力,这和日俄战争大同小异。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倘若中国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印度、南洋等地异族的民族必然会敬畏我国而向我投降,使全世界认识到亚洲是属于我国的,而永远不敢侵犯我国。这是明治大帝的遗策,也是我大日本帝国存立的必要大事。

考虑我国现状和将来,如欲建立昭和新政,必须采取积极夺取满蒙利权的方针,并借利权发展贸易。这样,不